

第一章 导 论

本书的目的在于考察教育与个人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为分析个人收入分配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第一节 问题渊引

自从生产是社会的生产以后，产品进而国民收入如何在各生产要素及其所有者之间进行分配就是一个必须予以明确回答的问题，因为“科学在分配法则上的错误对生产的有害影响，比生产理论本身的有害影响还要大”^①。所以，各经济学派和经济学家都十分重视收入分配问题，更有人把它看作是经济学的基本或主要问题。但若作一粗线条的划分，各种分配理论又都可以归结为两种分配理论中的一种，即或属于功能性收入分配理论，或属于个人收入分配理论。

功能性收入分配理论又称要素收入分配理论，它旨在说明要素价格的形成，如工资率和利润率，以及国民收入中各生产要素（如劳动、资本和土地）的相应份额。这又可因理论基础和分析方法的不同而分为两派。一派以古典经济学家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马克思及其当代继承者斯拉伐和按劳分配理论持有者为代表，他们以剩余范畴为基础，在不考虑地租的情

^① 克拉克：《分配伦理》 载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中文版，第939～942页。

况下，把工资率和利润率这两个分配变量中的一个看作是独立于另一个变量而先行决定的，另一个变量则作为剩余而加以决定。比如在古典分配理论中，工资率就被看作是独立决定的量或是“既定的量”，它由为维持工人生存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所决定，而包括利息在内的利润率则被看作是一个剩余量。这样，在既定技术条件下，工资率的水平就因此成为正常利润率所赖以决定的惟一条件，而且，除非前者减少，后者就不可能增加。从这也可以看出，古典经济学是内含有阶级矛盾分析法的。另一派以新古典经济学家威克塞尔、威克斯蒂德、马歇尔、瓦尔拉等为代表，他们以稀缺性和边际生产力论为基础，认为所有生产要素都参与了价值的创造，都对价值的形成作出了贡献，因而都可以获得与其贡献相对应的份额。工资率决定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利润率决定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地租则决定于土地的边际生产力。事实上，当所有要素的报酬率都等于其边际生产力时，一个社会的要素（资源）配置也就达到了最优。因此，在新古典学派那里，有关要素收入份额的理论就变成了要素定价理论，从而成了一般价格理论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偏好和资源的起始分配为既定条件下，只要经济达到了一般均衡，即一个经济体系在所有价格和所有数量上都有解，则收入的要素分配也就自然清楚了。但这一理论并没能对实际的收入分配作出预测，直到克拉克、萨缪尔逊、索洛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把它扩展到包括总生产函数。利用这种函数形式，新古典收入分配理论就能对所观察到的分配实践作出前后一致的解释，并可对未来的收入分配作出预测，比如保罗·道格拉斯就根据著名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发现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劳动收入的份额约占国民收入的 75%，后来各国的经验也证明，这一预测是基本符合 20 世纪以来的实际的。

无论是古典的还是新古典的功能性收入分配理论，它们对

于社会经济分析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社会阶级结构的泾渭分明和个人资源禀赋在长时期内的固定不变基础上的。但自进入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以后，这一基础变得不怎么牢靠了，即社会阶级结构变得相对松散了，个人的资源禀赋也较以往有着更大的可变性，工人不再是只有劳动收入，资本家也不再独享利润，因此，再将个人收入分配问题放置在“劳动、资本和土地”这样的大题目下进行讨论显然会捉襟见肘。于是，功能性收入分配理论虽然还在发展，并仍起着重要作用^①，但研究对象各异的个人收入分配理论也诞生了，并有后来居上之势。

个人收入分配理论旨在解释微观经济单位的收入分配形成和种类，以及与此相关的收入不平等衡量。它与诸如家庭、住户和个人等一系列经济单位的收入分配有关，而无论这一系列分散的经济单位是否遵从诸如性别、民族、教育、年龄或职业这些社会经济属性。它研究每一经济单位所得到的收入及其与总收入的关系，而对导致收入的各生产要素的产权并不介意。

由于产生得比较晚，也由于个人收入是建立在要素收入之上的，更由于个人收入的决定比要素收入的决定更为复杂多变，因此，与功能性收入分配理论相比，个人收入分配理论显得更不成熟和更不系统。阿特金森在一本书的结尾处写道：“……有关这一主题（个人收入分配）的东西还知道得太少。这是对经济学的控诉……”^②萨霍塔在一篇经典性的有关个人

^① 这可从美国经济学会 1946 年出版的论文选和阿西马科普洛斯在 80 年代末期主编的专题论文集可以看出。见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946), “Readings in the theory of income distribution”, Philadelphia: Blakiston 和 Asimakopulos, A. (ed.) (1988), “Theories of income distributi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② Atkinson, A. B. (1983), “The economics of inequality”, Clarendon Press, Oxford. p.285.

收入分配理论的文献综述中更用了“悲叹”一词来描述满意的个人收入分配理论的缺失^①。不过，这种“控诉”和“悲叹”并不意味着个人收入分配理论不曾存在过，它只不过是经济学家对现有理论不能有效地解释个人收入分配现象和预测个人收入分配变动趋势所表达出的不满以及对新的个人收入分配理论的希望而已，因为已有的文献表明，在过去的 100 多年中，还是涌现出了不少个人收入分配理论的。

（一）能力理论 the ability theory)

这是最早的个人收入分配理论，它认为是能力的不同决定着人们之间生产力从而收入的不同。由于能力的分布是呈正态分布的，因此，若能力确实决定收入分配，则个人收入分配也应该是呈正态分布的。但在 19 世纪末期，帕累托（1897）在搜集、分析了 4 个多世纪以来个人收入分配的资料后发现，个人收入并不呈正态分布而是呈对数正态分布，分布曲线向右倾斜并有一个扁平的尾巴，这意味着个人收入分配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这一发现也被有的经济学家称为帕累托法则。为什么能力分布与收入分布之间会存在着不一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深化了能力理论本身，更发展出了一系列替代的个人收入分配理论，其中包括人力资本理论，对此我们先按下不表。单就能力理论的发展来说，霍尔丹（Haldane, 1942）、罗伊（Roy, 1950）、毕尔克（Bjerke, 1961）、蒙德布劳德（Mandelbrot, 1960）等人认为能力是多方面的，这些能力对收入分配发生影响时并不是简单相加而是相乘的，即这些能力本身又相互影响。因此，虽然每一种能力是正态分布的，但各种能力相互作用所得的综合能力的分布却不是正态分布而是对数正态分布的，因此，个人收入分配也就呈对数正态分布。对

^① Sahota, G. (1978), "Theories of personal income distribution: A surve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 pp. 1-55.

各种能力每个人所强调的侧重点又有所不同。托马斯·迈耶 (Mayer, 1960) 强调了能力与责任心 (responsibility) 的关系, 莱达尔 (Lydall, 1976) 则对他所称之为“D—因素”的魄力 (drive)、精力 (dynamism) 和毅力 (doggedness or determination) 情有独钟, 认为这些因素在个人收入分配决定中比认知能力 (cognitive ability) 更重要也更偏斜, 因此个人收入分配会符合帕累托法则。

尽管有这些进展, 但能力理论仍然是相当简单和机械的, 它既不能有效地解释不平等和贫困存在的原因, 也无助于不平等和贫困的根治。而且, 人们也有理由发问: 能力又是由什么决定的? 对此, 能力理论或者无力回答, 或者能够回答, 但这已经不属于能力理论本身了, 因为一种理论能够得以确立和延续, 它是具有其特定的范式和范围的, 一旦超越, 它就属于一种新的理论了。

(二) 随机理论 the stochastic theory)

这也是一种很古老的分配理论, 它把个人收入的非正态分布归因于机会、运气和随机事件等因素, 认为幸运之神是被蒙蔽双眼的, 一个人既可能一夜之间成为富翁, 也可能一夜之间陷入贫困, 巨贾之子很可能面临失败, 布衣之后照样可以获得成功。随机理论又可分为两种。一种理论以罗伯特·吉布雷特 (Gibrat, 1931) 为代表, 认为随机因素的影响是长期的, 它会导致一个随机行走或马尔可夫链:

$$y_t = y_{t-1} + u_t = y_0 + \sum_{j=1}^t u_{t-j}$$

式中, y_t 是个人收入的对数, 它决定于一个随机事件 u_t , 而 u_t 又与 y_{t-1} 无关。吉布雷特等人虽不否认起始阶段的收入 y_0 会受能力和技能等的影响, 但随着 t 越来越大, y_0 的作用会越来越小, 到最后 y_t 就只主要取决于随机变量 u_{t-j} 了, 因而收入分配会越来越不稳定。这显然与事实不符, 于是卡莱斯基

(Kalecki, 1945)对吉布雷特的假设进行了改进,认为 u_i 与 y_{i-1} 负相关。但这一假设在理论上既无法证明,也缺少事实依据,于是就出现了第二种随机理论。该理论以米尔顿·弗里德曼(Friedman, 1957)为代表,认为随机变量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暂时的,这种影响只是围绕一个稳定的水平而上下波动,这也就是弗氏的永久性收入假设,即一个人的收入可分为暂时性收入和永久性收入,暂时性收入是短期内所获得的收入,永久性收入是终生获得的收入。人与人之间暂时性收入差别很大,因为在短期内偶然性因素的影响很大,但永久性收入的差别则不会很大。这样,弗里德曼就用随机因素来解释短期个人收入分配,因而收入分布更偏斜,但长期来看,随机因素的作用较小,因而永久性收入分配的偏斜性就较小。

随机理论并非一无是处,因为生活中确实有很多人因为某种偶然因素而改变了自己的职业、岗位,从而改变了收入状况,可谓是无巧不成书。但总的来说,随机理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是很差从而是很难令人满意的。特别是,它认为在从一起始分配开始后,能力、主观努力等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将越来越小,收入分配将主要取决于随机因素,其政策含义则是人们对于改善分配和消除贫困将无能为力。这显然是一种宿命论,既与事实不符,更与人们的美好愿望和主观努力相悖。用这种理论来指导分配实践将会是既无公平又无效率的。

(三) 人力资本理论 (the human capital theory)

把人们通过后天努力所获得的技能看作是资本并不是什么新的思想,比如斯密就曾认为劳动工资会因“业务学习有难易、学费有多寡而不同”^①。对自斯密时代到马歇尔时代之间的人力资本思想,凯克(Kiker, 1968)曾有过全面而精彩的

^①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中文版,第93页。

评述。但是，作为一种分配理论的人力资本理论的出现和被广泛接受则是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的事，库兹涅茨（Kuznets, 1955）、明瑟（Mincer, 1958）、舒尔茨（Schultz, 1963）、贝克尔（Becker, 1963）、丁伯根（Tinbergen, 1975）等人对此作出了重要贡献。

人力资本理论相异于前述以及其他个人收入分配理论的最主要的地方在于它是建立在个人最大化行为假设之上的，即人们为了使终生收入的现值最大，会向自身进行投资，换句话说，一个人终生收入的现值可以通过在早期对自身进行投资而达到最大。至于人力资本的收益率能达到什么程度则取决于它们的生产力和贴现率。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投资 1 美元于教育或培训所带来的收益率总会超过贴现率，因此，人力资本投资对提高一个人的收入总是有利的。这也意味着，人们以各种方式在自己身上花钱，已不仅仅是为了眼前消费了，而且也是为了甚至主要是为了在将来能获得较高的货币和非货币的回报，因此之故，教育和培训等也就有了资本的性质。马克·布劳格在一篇评述性的文章中称这一思想为“人力资本理论的内核”^①。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提出虽曾激起过某些固守传统者的不快^②，在 70 年代它也曾一度陷入低谷，但总的来说，发展是相当迅猛的。人力资本的概念也已超出教育而扩展至包括了迁移、培训、卫生保健、工作找寻、信息评估等，自 70 年代末

^① 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中文版，第 242 页。

^② 这两个例子可资说明。一是舒尔茨 1960 年在美国经济学会上所作的会长就职演说（人力资本投资）发表后，曾遭到谢弗（Shaffer, H）等人的批评，他们认为“把人看作是资本总的来说是不妥的”。二是贝克尔在 1964 年发表《人力资本》一书时，特地加了个长长的副标题“特别是关于教育的理论与经验分析”以免不必要的麻烦。

期以来有人甚至将学前教育、家庭教育等也视作是人力资本。不过，由于其他形式人力资本的形成与教育密切相关，而且教育的资料更易得，因此，就这一领域的绝大部分文献看来，主要还是考察教育与个人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比如教育与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教育与行业之间的收入分配、教育与男女之间的收入分配、教育与年龄组别之间的收入分配等。所以，萨霍塔（1978）把教育称作是人力资本理论“内核”中的“内核”。本书把题目定为“教育与收入分配”而不是“人力资本与收入分配”也是出于这一考虑。

人力资本理论之所以能得到迅猛发展，是因为与其他个人收入分配理论相比，它除具有直接建立在最大化假设基础之上这一理论优势外，还具有下列优点：（1）它能比较好地解释帕累托法则。因为人力资本本身具有一种自增强机制，即人力资本初始存量（主要表现为受教育水平）高的人更倾向于继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能得到更高的收入，而较高的收入又使他们更有能力继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自然地，这种倍乘关系会使总体收入分配偏离正态分布。（2）它更有实证基础。除那些奠基性的文献外，这一领域的绝大部分文献都是实证性的。它们一方面证实了人力资本对于一个人的收入形成确实有着重要作用，比如萨卡洛布洛斯（Psacharopoulos, 1973、1981、1985、1994）等人的工作表明，教育的私人收益率一般都在10%以上，在发展中国家和低层级教育，其收益率更在15%以上，远高于物力资本的收益率；另一方面又证实了人力资本对于收入不平等确实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比如明瑟（Mincer, 1974）发现美国1959年收入不平等的33%可由教育和工作经历来加以解释。（3）它的政策含义更可能导致效率与公平的较好兼顾。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们之间收入的差别主要是因为各自人力资本存量存在差别，人力资本存量高的人收入较高，人力资本存量低的人则收入较低。因此，若要缩小收入不平等

和消除贫困，很关键的措施是创造条件使低收入者和贫困者增加人力资本投资。这意味着，面对不平等和贫困，个人和政府是能够有所作为的。由于在当代社会，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由于“不像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它们能够通过积累而扩张，从而能够依所有权而保持高度集中，人力资本在任何规模上的扩展都必然会涉及在人口间的更广泛的分配”^①，因此，通过扩展人力资本来缩减不平等和消除贫困是能够比较好地兼顾效率与公平的。

正因为人力资本理论具有上述优点，所以萨霍塔认为：“如果不充分考虑人力资本的动态性质，任何收入分配理论都不可能被认为是完全的”^②。贝克尔更是认为人力资本理论“使个人收入分配理论回到了经济学中”^③。对他们的评论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我想是可以肯定的，即人力资本理论是当代经济学中最有影响的甚至可能已是占统治地位的个人收入分配理论。

以上是本书写作的理论背景，它的直接起因则是为了回答下列几个问题。

1. 教育凭什么参与收入的分配？任何分配理论都有其价值论基础，人力资本理论也不例外。那么，什么是它的价值论基础呢？从现有的文献来看，这个问题似乎并没有得到明确的回答。一种要素能够参与收入分配，是因为它对收入的创造作出了贡献；该要素能够得到的收入份额也只能以它对收入创造

① Ahluwalia, M. (1990), "Policie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Asian Development Review*, 8(1), pp. 122~123.

② Sahota, G. (1978), "Theories of personal income distribution: A surve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 p. 14.

③ 加里·贝克尔：《人力资本——特别是关于教育的理论与经验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年中文版，第 78 页。

所作的贡献为限。在工业社会，国民收入是劳动、资本和土地共同创造的结果，故劳动得到了工资，资本得到了利润，土地则得到了地租。在后工业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国民收入的创造除有传统三要素的贡献外，人力资本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自然地，人力资本（教育）是应该得到其相应的收入份额的。这也就是说，教育之所以要参与收入的分配，是因为它对国民收入的创造（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事实上，关于教育对经济增长之贡献的文献也有很多，但正如舍温·罗森（Rosen, S）所指出的，关于教育对经济增长之贡献的文献与教育参与收入分配的文献“迄今尚未清楚地结合起来”^①。本书即是想把二者清楚地结合起来。

2. 教育如何影响收入分配？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通过提高人的生产能力从而带来较高的回报率来影响收入分配。我认为这种解释是不彻底的，因为它无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一个大学毕业生在某一国（比如计划经济国家）收入很低而在另一国（比如市场经济国家）却收入很高？或者说为什么一个大学毕业生在某一时期（比如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收入很低而在另一时期（比如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时期）却收入很高？对此，本书将给出一个解释，以补充完善现有的解释。

3. 教育对收入分配的长期变动有什么影响？也许是由于长期资料的短缺，这一领域的大多数文献是静态地考察教育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的，比如对某一年教育收益率的计算、某一年收入不平等中教育的解释份额等。这很必要，但远远不够。在某种意义上，动态地考察教育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更

^① 舍温·罗森：《人力资本》载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中文版，第736~744页。

重要的，因为静态事件毕竟只是动态过程的一个环节，不明了长期趋势就难于把握短期效应。所以，本书也将回答教育扩展对收入不平等的长期变动将产生什么影响这一问题。

4. 中国教育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是如何一种状态？为什么会这样？中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这种特殊性在教育与收入分配的关系上也表现明显。长时期以来，中国学者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但对它的分析却差强人意。自 80 年代末期以来，已有中外学者（Jamison & Gaag, 1987; Byron & Manaloto, 1990；李实和李文彬，1994；诸建芳、王伯庆和使君多福，1995；等等）开始用人力资本理论来分析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并已取得相当的成果。但他们的研究至少还存在两个问题没有很好回答或没有来得及回答。（1）他们的研究揭示，中国教育与个人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很不明显，即存在着我所称之为的脑体收入相对倒挂。但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倒挂？这个问题远非是不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个关键问题，但他们的回答却或者似是而非，或者很不系统。（2）他们的研究只截止到 1992 年，而中国却恰恰在 1992 年以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那一年，中国政府宣布中国要实行市场经济，经济体制要进行根本性变革。那么，资源配置方式的根本性转换和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对教育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但他们却似乎还来不及回答。因此，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回答也构成本书写作的缘由。

第二节 逻辑结构与主要观点

首先需对概念作一简要界定。教育与收入分配是本书最关键的两个概念，而教育与收入分配又恰恰是学术界至今都难有统一定义的两个概念。根据简单和够用的原则，在本书中，除非作特别交待，教育仅指正规学校教育，即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相应指标有识字率、入学率、平均受教育年限

等；收入分配则指个人收入分配，相应指标有基尼系数、某一人口组的收入份额、教育收益率等。

本书共分八章，除导论外，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包括第二、三、四章，主要回答教育为什么以及怎样参与收入分配等问题，因而可以看作是本书的理论基础。第二章考察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教育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这可从两个方面得到印证，一是模型演变，二是实证分析。经济增长模型的演变，既揭示着教育等人力资本对于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作用，也体现了人类对于挑战自然制约的能力和智慧。各国的实证分析则表明，我们较之前人的丰裕确实是得益于对自身的投资和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的。教育之所以具有如此威力，乃因为它为现代生产提供了高素质劳动力；加速了科学技术的创新和扩散，相对地拓展了资源的供给边界；促进了新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改进了人的有限理性，从而能够降低交易成本；等等。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影响收入分配是因为它能提高受教育者的生产能力。这是正确的，但不全面。实际上，教育影响收入分配的更主要的途径还在于它提高了受教育者的配置能力。配置能力是一种发现机会、抓住机会、使既定资源得到最有效配置的能力。它先于生产能力发挥作用，并制约着生产能力的发挥。对此，第三章将进行专门分析。配置能力存在的价值依赖于经济非均衡的存在，即资源配置优化还有改进的空间。中国现正处于全面的社会经济转型期，经济处于严重的不均衡之中，既有一般国家的产业非均衡和区域非均衡，更有转型国家所特有的体制非均衡。这意味着配置能力在中国有很大的运作空间，进而意味着在中国教育对收入分配应该有很大的影响。

教育对收入分配是否有影响，可从教育收益率的高低作出判断，因此，第四章的主要内容是分析教育收益率。首先交待

了教育收益率的计算方法。国际上通用的计算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立足于成本—收益分析之上的精确法；另一种是起始于明瑟工作的收入函数法。前者能计算教育的私人收益率和社会收益率，后者则只能计算教育的私人收益率。尽管这两种方法都存在着不足，但瑕不掩瑜。对各国教育收益率的估算表明，教育收益率的分布和演变具有如下特点：教育收益率比较高，一般都在 10% 以上；初等教育的私人收益率高于中等和高等教育的私人收益率；落后国家的教育收益率高于发达国家的教育收益率（这意味着中国的教育收益率应该比较高，即教育与收入分配应该强相关）；教育的私人收益率高于教育的社会收益率；等等。

第二部分为第五章。这一章动态地考察教育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认为教育扩展既非一味地扩大收入不平等，也非一味地缩小收入不平等，而是会先扩大后缩小收入不平等，即教育扩展与收入不平等变动之间存在着一个倒 U 型关系。这是一种假设。为验证这一假设，该章接下来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跨国横向分析，二是一国纵向分析。跨国横向分析考察了 49 个国家（其中 13 个低收入国家、23 个发展中国家和 13 个高收入国家）的资料，并用各种教育指标和收入不平等指标进行了一元二次回归分析，结果均显示，教育扩展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确实存在着倒 U 型变动关系。一国纵向分析以英国 19 世纪的教育扩展与收入不平等变动的轨迹为例，结果也验证着倒 U 型假设。教育扩展对收入不平等的长期影响之所以呈倒 U 型变动，是教育扩展之结构效应与抑制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结构效应源于教育的供给小于教育的需求，从而源于受过教育者与未受过教育者或受过较多教育者与受过较少教育者之间工资差距的扩大。抑制效应则源于教育供给大增之后所导致的竞争效应和渗漏效应。结构效应和抑制效应都贯穿于教育扩展的始终，但在早期前者大于后者，在后期则后者大于

前者，故在教育扩展中收入不平等会先扩大后缩小。

第三部分包括第六、七、八章，主要分析中国的教育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第六章实证地考察了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教育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改革前，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中国实行的是一种工资基本冻结的政策。工资冻结是一种扭曲的年龄—教育—收入关系，它既不利于青年人，更不利于受教育较多者，对某高校 1956~1976 年间不同职称（可近似地视为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替代指标）教师的工资损失状况的估算充分证明着这一点。1977 年后，工资冻结政策被解除，职工工资逐年有所增长，但中外学者对 1992 年以前有关年份和省份教育收益率的估算以及我对 1995 年 11 个省市教育收益率的估算却表明，中国的教育收益率仍然很低，1992 年以前绝大多数年份在 4% 以下，1995 年全国平均的收益率为 5.73%，中央、省级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为 5.03%，外企职工为 6.9% 从这可得出两点结论：一是教育收益率为正，说明中国并不存在脑体收入的绝对倒挂；二是教育收益率虽然逐年有所提高，但仍远低于理论水平，说明中国在今天教育仍没有得到其应有的回报，即存在脑体收入的相对倒挂。这种倒挂已造成了诸多负效应，主要是脑力劳动供给不足和教育供给不足，从而影响了经济的增长。

为什么中国的教育收益率会这么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构成第七章的内容。人力资本理论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存在健全的劳动力市场，即教育对收入分配发挥作用必须通过劳动力市场这个中介。而中国恰恰是劳动力市场不健全或说劳动力市场存在制度性分割，这是其教育收益率低的根本性原因。为论证这一点，第七章首先评述了西方的三种分割劳动力市场理论，即职位竞争理论、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和激进的分割劳动力市场理论，紧接着分析了制度性分割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特征。这种市场是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结果，也是计划

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形成的行政性、供需主体的非主权性、非竞争性、非流动性、教育作用的非均质性等特点。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导致了专业和兴趣不对口，抑制了配置能力的发挥，也抑制了生产能力的发挥，结果自然是教育收益率低下。这也可从 1995 年教育收益率比 1992 年以前各年高，外企职工收益率比国企职工收益率高这一数字比较中得到印证，因为这种收益率由低到高的变化正反映着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逐渐松动的过程。

第八章是本书的结束语，概括地提出了一些对于中国改革和发展特别是对于理顺教育与收入分配之关系的政策建议，并指出本课题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尚需着力分析的领域与问题。

第二章 教育与经济增长

有关经济增长的思想与整个经济学几乎具有一样长的历史，事实上，如何富国裕民也正是经济学所需回答的问题之一。纵观经济学诞生以来 200 多年的历史，可谓是学派林立，观点各异。自然地，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也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重商主义把对外贸易看作是经济增长的惟一源泉，重农学派则主张经济增长的惟一源泉是农业和土地。亚当·斯密在其巨著《国富论》中以大头针生产这一经典例子说明了经济增长来自社会分工（从而市场规模的扩大）和资本投入的增加。马克思则为劳动谱写了一曲至今还在广为传诵的赞歌，认为劳动，也只有劳动才是物质财富和经济增长的源泉。到了 20 世纪初期，熊彼特把企业家精神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认为经济增长是通过企业家的“创造性破坏活动”而实现的。尔后更有哈罗德、多马、纳克斯、罗斯托等人奉物质资本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因此，要摆脱贫困、实现经济增长就必须跨过资本积累这一门槛。进入 20 世纪中叶以后，经济增长源泉的皇冠则被舒尔茨等人戴在了教育等人力资本的头上，教育不再是纯消费性的了，它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过，尽管舒尔茨的这一理论被人誉为是“经济思想史中的人力投资革命”^①，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对教育之经济功能

^① Bowman, M. J. (1966), "The human investment revolution in economic thought", *Social Education*, Spring: 111 - 137.

特别是教育对经济增长之贡献的认识只是本世纪以来的事，因为早在 2000 多年前（管子·权修）中就有“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百年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的记载。几乎是同一时代的柏拉图也认为教育是一个社会之经济机体健康的前提条件，因为它能使民众更明白事理，所以，一个社会必须把其财富的相当一大部分投入到教育中去。威廉·配第被看作是第一个对人力资本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阐述的经济学家^①。他认为人的“技艺”是除土地、物力资本和劳动力以外的第四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并从人的劳动使人力的货币价值生息这一假设出发，对英国当时的“有生命的资本”的货币价值进行了估算。斯密也认为劳动力的技能是经济进步的重要力量。他在（国富论）第二篇第一章“论资财的划分”中，把“社会上一切人民学到的有用才能”看成是固定资本的四个组成部分之一，这种才能的获得“须受教育、须进学校、须做学徒、所费不少。这样费去的资本好像已经实现并且固定在学习者身上。这些才能对于他个人自然是财产的一部分，对于他所属的社会，也是财产的一部分。工人增进的熟练程度，可和便利劳动、节省劳动的机器和工具同样看作是社会上的固定资本。”^②马克思把发展了的个人称为资本，“从直接生产过程的观点来考察，充分发展个人就是生产固定资本，这种固定资本就是人类自身”^③。马歇尔虽然把人力资本从他的“财富”和“资本”

① 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 2 卷），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2 年中文版，第 736 页。

②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 1972 年中文版，第 257~258 页。

③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案》（第 2 册），人民出版社 1963 年中文版，第 364 页。